

都市
与
文化
译丛

后大都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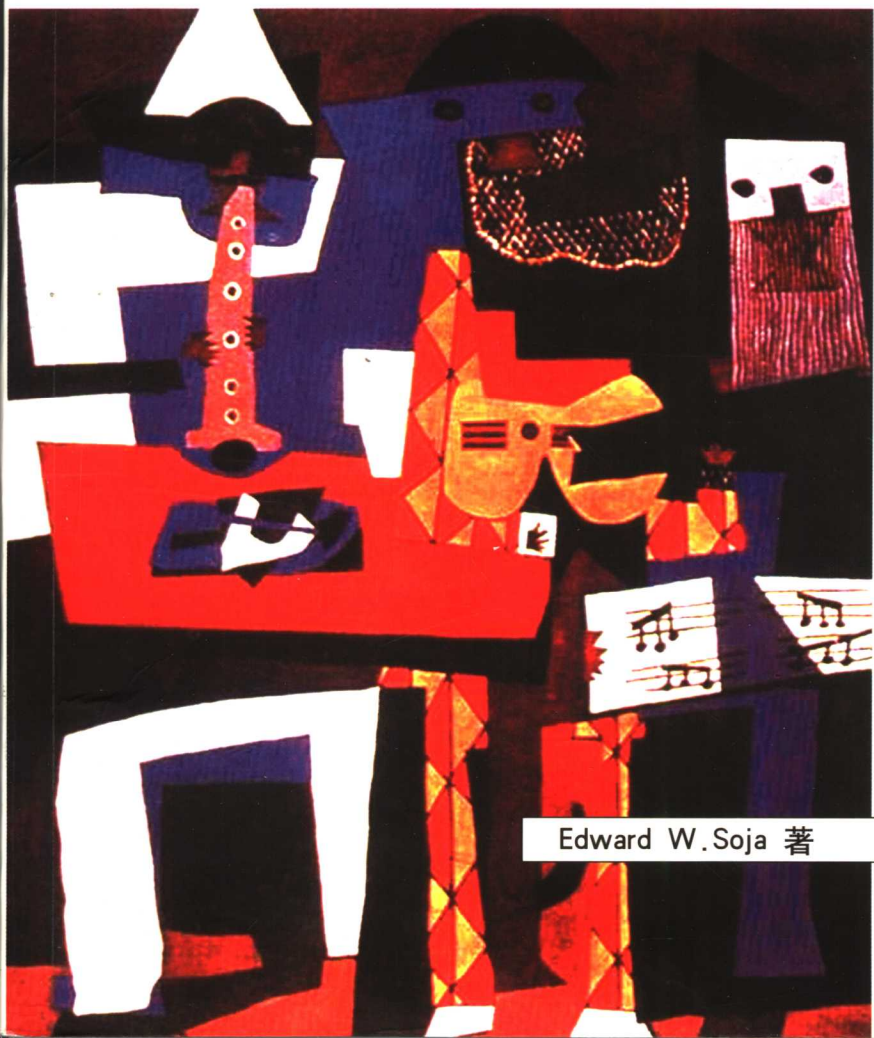
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

Postmetropolis

Critical Stud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

包亚明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Edward W. Soja 著 李 钧等 译

后大都市

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

Edward W. Soja 著

李 钧等 译

20064 12月 169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 Edward W. Soja

The right of Edward W. Soja to be identified as author of this work has been asser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First published 2000

Reprinted 2000, 2001

The chinese edition of this book published by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is authorized by Blackwell Publisher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研究重点学科规划项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大都市/(美)索亚(Soja, E. W.)著;李钧译.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12
(都市文化译丛)
ISBN 7-5444-0411-0

I. 后... II. ①索... ②李... III. 大城市-城市社会学-研究-洛杉矶 IV. 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37707号

都市与文化译丛 包亚明主编

后大都市

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

Edward W. Soja 著

李钧等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易文网: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编: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印刷四厂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9.25 插页 4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100本

ISBN 7-5444-0411-0/C·0004 定价:39.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译丛总序

亨利·列斐伏尔作为“都市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一再强调空间问题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空间性与社会性、历史性的思考应该同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在理论视角。列斐伏尔将空间的重组看成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列斐伏尔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在于世界范围内工业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转变，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对都市空间不断进行重构，而都市化则是资本建立其稳固基础的必然要求。同时由于城市同样是日常生活、使用价值消费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场所，作为区域性的具体地点，城市是全球化矛盾最突出、最尖锐的地方。因此“都市研究”的重要性，已经主要不在于全球范围内都市人口的急速膨胀，或者都市化过程的广度与深度，而在于城市已经成为全球化矛盾的焦点，成为了都市问题与更为隐蔽的文化问题的结合场所。

可以说，“全球化”作为一种改变现状的变化范式，已经成为了替代“现代化”的一种话语和社会想象。显然，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学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这一文化认同问题与全球化所造成的时间-空间观念上的巨变是联系在一起的。如今，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直接、更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作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由于互联网等科技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推动，人类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迁，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间-

空间意义上缺席的东西所取代。于是社会关系被从相互作用的地域性的关联中“提取出来”，在对时间和空间的无限跨越的过程中进行重建。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将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混杂排列称为“时空分延”，他认为这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吉登斯不仅看到了全球化是政治与经济两种影响合力推动的进程，而且认为全球化在建立国际间新秩序的力量对比的同时，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都市研究”领域的核心人物之一大卫·哈维则将时间与空间的复杂交织命名为“时空浓缩”。

如果说，全球化对于都市问题的深刻影响并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经济上的影响，而是我们生活中的时-空观念的巨变；那么，与全球化互为表里的消费主义，就必须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加以讨论。消费主义已经不是简单的消费产品、消费市场所能涵盖的。鲍德里亚早在1968年出版的名著《物体系》中，就指出过：“消费的对象，并非物质性的物品和产品：它们只是需要和满足的对象。我们过去只是在购买、拥有、享受、花费——然而那时我们并不是在‘消费’。原始的节庆、封建领主的浪费、19世纪布尔乔亚的奢华，都不是消费。……财富的数量和需要的满足，皆不足以定义消费的概念：它们只是一种事先的必要条件。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也不在于影像和讯息的口腔或视觉实质，而是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功能的实质；它是一个虚拟的全体，其中所有的物品和讯息，由这时开始，构成了一个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那么它便是一种记号的系统化

操控活动。”(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台湾时报出版社,1997年,第221、222页)

鲍德里亚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指出了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它既被指涉又是缺席的,既被包括又被排除——在物品构成的系列中,自我消费的是关系的理念。因而,消费行为应该被看成是一种非物质性的实践。这种消费行为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和满足需求的“被动”程序,而是一种“主动”的关系模式。这不仅仅是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也是人与集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系统性的活动和全面性的回应。正是在这一消费之上,文化体系的整体才得以建立。在此,我们重又回到了文化研究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与消费主义对当代日常生活的侵袭,并不是在抽象的理论层面上实现的,而是通过兼具市场和观念两大特征的大众文化潜移默化地渗透的。大众文化一方面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最具活力、最具扩张性的产业,另一方面也是消费主义观念最积极、最有效的推广机制。可以说,消费主义原则起主导作用的社会,必然同时是大众媒体与大众文化起主导的社会。在当代社会中,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体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不再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获取信息,而是坐在家让电视把社会生活的画面直接送到眼前,消费社会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媒体社会。的确,没有任何其他一种媒体像电视这样充斥在我们的文化之中,情景戏剧、体育运动、谋杀案审理、快餐商业广告、遥远的地方发生的战争等都通过电视源源不断地进入我们的家庭。电视渗透的面是如此之广,影响又是如此之深,它对于我们形成对世界的看法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当代大众文化已经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私人生活空间和社会

生活空间,并且极大地改变了当今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形态。当代社会中的读者、听众、观众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受众和大众实际上是由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所造就的,因为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经验加以一体化,从而强化了大众化一体化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当代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在型塑大众的个人经验和社会经验的过程中,直接把大众塑造为一种鲍德里亚意义上的“黑洞”,塑造为一种漠不关心的“沉默的多数”,大众接收各种各样的传媒内容时,只是为了获得其中的娱乐性场面,从而进一步消除传媒资讯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迎合着大众的心理,通过娱乐性的“狂欢文化”场面“复制”着大众的口味、兴趣、幻想和生活方式,从而传媒的操纵实际上是从外部强加了大众的意识。

全球化与消费主义在促成大众文化急剧扩展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关系。如同鲍德里亚所说,如果在传统社会中大众与知识分子的对立表现为知识分子是主动的观念传播者和灌输者,大众是被动的接受者的话;那么,在大众文化与传媒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中,大众与知识分子的对立则表现为大众不再同知识分子相关,大众以“沉默”来对抗传媒的主宰和知识分子的统治企图。显然,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与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在整合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在影响着针对自身的批判机制。

当都市问题与文化问题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时候,“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内在联系也就更为明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沙朗·佐京认为人类生活不是简单地运作于城市之中和城市之上,而是很大程度上也从城市发源,从城市生活复杂的特殊性和激发点上发源。如果说主流的社会科学视野和正统的科

学社会主义在阐释人类历史和社会时,已经日趋忽视这些空间特殊性的解码性潜力,那么现在则到了把这“隐没的维度”带回到画面上的时候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沙朗·佐京提出了“谁的文化?谁的城市?”的问题。她认为文化同样是控制城市空间的一种有力手段。作为意象与记忆的来源,它象征着“谁属于”特定的区域。文化同时也是由社会差别与城市恐惧引起的冲突的一个更为明显的场所。“都市研究”洛杉矶学派的领军人物索亚则认为,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和居所的生产。这一生产的空间性过程或“制造地理”的过程中,人类主体总是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之中,人类主体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一方面,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塑造着我们周遭的空间,与此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性或社会性生产出更大空间与场所,而人类的空间性则是人类动机和环境或语境构成的产物。因此,在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型塑我们思想的文化观念依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作为相当对立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虽然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与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但“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独特的视角与研究方法,无疑已经成为了当代人文社会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的组成部分。正是基于都市问题与文化问题的内在联系,我们才将本翻译丛书命名为《都市与文化译丛》。这是一套以介绍“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领域重要成果为目的的翻译丛书,它同时也是一个更大规模的“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出版计划的组成部分。这个完整的出版计划将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本套“都市与文化译丛”;一是“都市与文化丛刊”,目前已经出版了三期,它以发表都市研究

与文化研究论文和译文为主,其中部分译文是本译丛的一些先期成果;另外在时间与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们还将推出“都市与文化论丛”,主要发表关注本土问题的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成果。希望这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出版计划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的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工作。

包亚明

前 言

当我们进入新千年时，都市研究领域在城市研究的学术法则和主题的多样性上从未像现在这样显得如此旺盛丰富，有如此多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如此地与我们时代的主要政治经济事件相结合，以及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如此地动荡。现在可能是研究城市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因为有如此多的新东西和新挑战要应对，同时，就如何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把握新的都市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存在着不一致。

自 20 世纪 60 年代都市危机以来，几乎世界所有主要的（以及次要的）大都市区域都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有些地方如此强烈，以致 30 年前的东西今天几乎不可辨认。这些变化，一些都市学者在世界经济更宽泛发展的背景下将其解释为“都市重构”过程的产物。几乎每个都市研究者都同意：这一重构过程在过去 30 年里是特别广泛、特别强烈的。不过，一致性到此为止。一个极端上，一些人宣称，因为都市转型如此之剧，所以所有传统都市分析阐释框架都失效了。他们要发展全新的结构来理解完全转型的都市景观。在另一个极端上，许多有历史头脑的学者一遍又一遍地强调与过去的连续性，认为我们进行都市研究的方法没有从根本上失效，故不必根本转变，只要更新就行。比起固执于一端来，不如说上述两种观点在不同情况下都可能是正确的。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太过自信地认为 20 世纪晚期城市所发生的事是一个革命性转变的开端，或认为它不过是都市生活古老故事一个小小的波折，这些断言都太早了。不过，就本书的标

题来说,我的立场更接近前一种可能性,我认为,在我们习常认为的现代大都市中,以及我们理解、体验、研究城市的方式中,发生了很显著的转变——即使不是转型的话。为了能将变化更大的部分从最为持续未变的部分中区分出来,我选择了“后大都市”一词作为标题,来表示所谓的新都市活动,哪怕这个词还未被建筑师和设计师采纳用于其他或更狭义的目的。作为结果,本书最主要的企图是指示当代城市以及我称为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学术领域的新异之处。

所以,阅读此书的一种方式是将其作为对城市和区域当代批判性研究的导读性文本,就算我涉及较远的过去,它也来自现在的视角,与对都市化进程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活动最近产生的理解与阐释方式有关;研究城市 and 了解城市与都市生活更通常的方式也未忽略,不过不作为重点强调,在这方面,其他一些书写得更好。我关注的是各种研究城市和区域的新方法,许多方法——就像本书的书名——都有一个“后-”的前缀来表示这不是一个完全的断裂,而是与成熟实践与规范传统的显著分离。尽管我不想把书名完全与这些有“后-”前缀的词中最引人争议和误解的后现代主义联系在一起,但我承认在《后大都市》中,我所考虑的是都市研究一种富有洞见和批判性的后现代方法,它关注今天的新异之处超过关注共同之处。故而,标题可以与“后现代大都市”互换使用,可以解释为一种现在所谓“后现代都市活动”的表现。

插在这一关于城市与区域解释性文本中的,是文化研究领域批判性思考和分析的其他以“后-”为前缀的方法:后结构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后马克思主义分析。同时,我也关注——用比我以前更批判的方式——这些方法的非以

“后-”为前缀的方式,特别是创新的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它们塑造了激进地理学和我曾统称为“地缘政治经济”的都市、区域、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发展。实话说,我的一个目的是激励批判性文化研究和地缘政治经济的多产性结合,这两个知识研究和认同的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走到了一起,仅仅在一些似乎不可调和的地方再度分离。如果哪位读者感到,这个将政治经济和文化更紧密结合的企图被我对后现代主义的拥护冲淡了的话,我要说,它们跳过了我后现代主义最明晰的地方。我希望有足够的东西留下,能够让日益增多的反后现代主义者中最愤世疾俗者也感兴趣。

采取这种折衷的方式是有代价的,它无疑干扰了研究城市和都市生活更为专门和专注的方式,以及更纯粹地摆脱了现代主义思想的后现代主义阐释方式。不过,我的折衷受制于两个引导性重点,它们更加聚焦和澄清文本。第一个重点是和所有严肃学者一样的,生产知识不是为了其自身目的,而是为了把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实践效果。这种有意识的进步和解放性的筹划常常排斥性地归属于现代主义思想与实践,所以被认为与后现代主义视野不匹配。我拒斥这种简单逻辑及其隐含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归类对立。现代主义批判理论和阐释模式继续影响我对后大都市的揭示,特别是在理解今天还与过去相同的方面。至于理解当代世界中新异之处的实践和理论意义方面,我认为后现代主义更好一些,我将在每一章对其试加展示。

使这本书不同于批判性学术其他形式的是,我也采取一个明晰的空间性或——如你希望——地理性视野来看待实践知识以及生产和政治实践的推动,它们试图减少阶级、种族、性别及其他不同社会权力源泉的压迫和不平等。在这个意义上,我把

我对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聚焦在一些可达到的目标上，如在文献中很少有这样明晰结合的词——“空间正义”和“区域民主”。在没有忽略其他批判性、社会性和/或历史性方式的同时，我在文字上和修辞上“将空间摆在首位(首先是空间)”，突出肯定性的空间或地理想象的力量与洞见。整个文本的语言有意识地空间化了，试图把人类生活基本的和全包的——但经常被掩埋或忽视——空间性带到阐释的表面。

批判性空间想象的相似的突出地位影响了我对大量关于城市和区域文献的引证选择。我收集特别有空间性洞见的文献，无论主题是城市的最早显象还是对后大都市转变的最近回应。所以，弃选了很多学术著作，有些很有洞见，但我看来没有显著的批判性空间意识，或者无助于空间化批判性思考和实践的提高。对于许多读者来说，这似乎将范围过于狭窄化了，但我的想法正好相反。我的目标是扩展城市和区域批判性思想的范围，打开理解都市空间性是如何经验地被感知、理论地被把握、实际地生活于其中的新方式。

这给我带来了第二种阅读此书的方式。《后大都市》开始是一个大手稿的一部分，这份手稿是六年前我交给布莱克威尔(Blackwell)出版社的，名为《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高级编辑戴维以他温和而有力的方式建议我把书一分为二，前半部分以原标题出版，而原稿第三部分，包括“探讨后大都市”的三个长篇章，可以在后面以更小得多的篇幅出版。我同意拆开并试图使《第三空间》自成一体，里面没有了它最经验性的冲击探索，以及我定义为第三空间视野和认识论的更实践性的应用。《第三空间》出版于1996年，不久，布莱克威尔乐观地宣布，《后大都市》将是它的姐妹篇。但《后大都

市》有它自己的生命,有更雄心勃勃的计划。回溯原来三章发生的事情有助于理解这本书里包含的东西。

原第一章,修订后成了这里的第五章。它总结了第一部分:“重描城市空间的地理性历史”,详细审视了有代表性的洛杉矶联合都市的历史发展,选取了斯科特和索亚编的《城市》(1996)第十四章的相同材料。第一部分前面的四章,是过去三年里写的新材料。它们包括对从 11 000 年前到现在我所称为城市和都市活动的“地理性历史”的广泛扫描。我以介绍几个关键概念开始,如“都市生活的空间特性”,如一个它最内在的发展动力——即我所称的“村镇联合”:都市积聚的激发的东西。文本中这里和其他地方都强调都市化和都市活动的内在“区域”性。这些概念引导着“城市空间”——另一个空间化术语——历经都市革命三个划时代转型的地理性历史的讨论。

第一次都市革命发生在一万年前,西南亚高地区域,我将论述它导致了全方位以都市为基础的农业发明。第二次发生在 5 000 年后的新月沃土低地,产生了政治革命,导致了城市-国家和以城市为基础的帝国、王权、有组织的社会阶级和等级化的社会权力的形成。又五六千年后,都市活动进入了西欧工业革命开始的新阶段,形成了都市-工业资本主义的基础。这个过程在前三章追溯过。第四章继续工业资本主义城市的发展,通过在 20 世纪 60 年代都市危机和用来理解这一重要转折点的地缘政治经济新方法所阐明的一系列现代化,来探讨都市研究的知识领域。于是关于洛杉矶的总结性章节就提出了问题,我们经过了 30 年强烈的都市重构所见证的东西,是否是第四次都市革命的开端,我把这个问题和许多问题一道,向不同观点开放。

原来手稿的中间一章现在变成了六章,组成了第二部分:

“后大都市的六个话语”。这里我展开了思想的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学派，它们在过去几十年中形成，以理解影响 20 世纪晚期世界的“新都市化进程”。这些观点各自把后大都市描述为：(1) 一个弹性专业化的后福特方式工业大都市；(2) 一个全球化的城市-区域或世界城市；(3) 一个后郊区的扩散型城市或大城市带；(4) 一个强化不平等和社会两极分化的碎形城市；(5) 一个堡垒城市的监禁群岛；(6) 超现实模拟城市的集合，这里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像电脑游戏一样。第二部分的目的是，论证后大都市最好把六个话语结合起来理解，不要认为哪个比别的好；同时还要保持开放，以在未来发展更多同等重要的阐释性框架。六个章节里很重要的特征是学者们基于洛杉矶或关于洛杉矶的工作，如果说确实有一个批判性都市和区域研究的洛杉矶学派，那么这六个话语就代表着它主要的分支。

老手稿的最后一章扩展成三章组成第三部分：“生活空间：重新思考洛杉矶的 1992 年”。这里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单一事件即司法骚乱上。这次骚乱发生在对殴打罗德尼·金的三个警察的第一次审判之后，用这一特殊的时刻来引发对 1992 年以来的后大都市发生事情的更普遍阐释。在某种肯定不会使所有读者满意的实验性情绪中，我写了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它们完全都是从对 1992 年发生的事作空间意义探索后出现的大量文献的摘引，而我的评论则放在脚注上。这里最有特征的材料是霍珀的未刊稿，她小心而又惊讶地允许我引用，手稿名为“身体、城市、文本：公民罗德民·金案件”；还有关于 1992 年事件很有风格、表演性很强的“黄昏——洛杉矶 1992”，它由纪录戏剧艺术家史密斯写作并表演。我结束《后大都市》的方式并非是对过去一个穷尽性的总结，而是开放性的、谨慎推理式的讨论——完全

用我自己的语言——讨论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大都市转变的两个新波动：都市重构 30 年后一系列重构危机的出现，以及更好控制新都市化进程和引导后大都市走向更大空间正义和区域民主的集体奋斗的开始。

尽管《后大都市》和《第三空间》可以作为两本不同的书来读，它们还是有紧密内在联系的。《后大都市》是它早些姐妹篇的续编，将其广泛的理论论证和“三维辩证”的方法应用到对过去 30 年城市发生的事的研究上，它同时是空间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的视角。两本书都有一种“将空间置于首位”的企图，这种企图不是一种排除了理解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理论性模式的视角，而是在批判性思想和实践中超越了它们长期的优先权，重新肯定一种对于批判性空间想象、一种我首先在《后现代地理：批判性社会理论中空间的重新肯定》中提出的论证同等重要的力量。我在所有的章节中推进了《第三空间》的理论观点，常常对一些具体段落和章节进行回溯以加强这些联系。但我也试着让不熟悉前一本书的读者有可能去理解它最有关的理论和论点，特别是在第一部分导论中是这样。它有一定的帮助，故而在读《后大都市》之前，没有必要先读《第三空间》。

除了对当代批判性城市和区域研究的介绍，以及《第三空间》的续篇，还有与《后大都市》相结合的第三本书。这本书是关于洛杉矶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关于经过 30 年积累的这一典范性都市区域大量的学术文献的直接表述，同样我也突出一种批判性的空间视角。我把洛杉矶放在首位，我研究这个后大都市，把它作为批判性城市和区域研究的范例，考察洛杉矶和围绕它所谓“可生成的特性”所产生的大量文献。关于洛杉矶，有如此多的东西可说（其实每个城市都是这样），它是唯一的和不可比较

的。但是,甚至这些例外的性质都可以归属到当代都市生活更一般和更全球性的理解以及仍在进展的后大都市转变的冲击中去。

于是我把洛杉矶当作一个症候性的生活空间、一个代表性的窗口,通过它,人们可以在其整个表现的一般性中发现在过去30年已经重塑世界每一个地方都市生活和城市的新都市化进程。这些重构过程的效应可能在此更强烈地发展,在洛杉矶可能比其他地方更早地看到它们复杂的相互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别的城市就不能开启同样的窗口,换句话说,洛杉矶发生的事也能在皮若亚、斯肯索普、贝洛奥里藏特和高雄发生,而且很强烈,并呈现出另外的方式。如果你会寻找,那就可以处处看到新都市化进程,不过在所处的特殊地理语境中,它们会采取不同的形式。

像每一个社会过程一样,后大都市转变在时空上不稳定发展着,在某地比别的地方更快更深,这一地理性历史上不稳定的发展过程,在所有人类环境的研究中都是一个综合主题和主导旋律。在此它显示的是,无论你的批判性关注点何在,总可以在后现代都市活动中学到东西。于是这本书中对洛杉矶的每一指向都服务于一个双重目的。它既是一个都市区域后大都市转变中特别的语境效应的演示,又是“和其他生活空间进行比较分析的引导”。

我为三本书合为一本的尝试负责,为它会引起的读者的任何问题负责,我也完全为从其他著作中的大量征引以发展我的观点负责。如果我在哪个方面错用了这些引证,我先致歉意。更肯定的是,我要感谢所有为这本书的写作有所贡献的人,首先是 UCLA 都市规划系我过去和现在的学生,他们是:巴巴拉·